

【产业经济】

后发转型大国价值链的空间重组与提升路径研究

周密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全球价值链嵌入范式下,后发转型大国的价值链提升将陷入被动追逐与形式模仿。双重价值链范式既重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约束作用,又重视国内价值链的多元化禀赋特征。考察双重价值链的结构特征及空间组织变化是后发转型大国价值链提升的新出路。本文以双重价值链匹配紧密度与匹配高度的时空演进为中心,通过空间特征识别—影响因素差异化弹性—多元化路径的分析脉络,提出了“价值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新”的理论逻辑。指出,后发转型大国双重价值链呈现四大经济区划的空间特征,引导价值发现,形成当前价值链提升的初始条件;要素、结构、制度与路径依赖等因素对双重价值链提升具有差异化影响,是价值管理的核心,也是推动价值链提升的实现手段;初始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的差异化调节共同决定了四大区域价值创新的过程,将形成价值链提升的多元化路径,即以全球化为导向的链条升级、以转化应用为导向的技术升级、以国内市场拓展为导向的功能升级、以专精化为导向的产品升级。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国内价值链; 空间重组; 提升路径

[中图分类号]F4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3)08-0070-13

一、问题提出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Globe Value Chain,GVC)中份额偏低、主导权不足已成为制约价值链提升的主要因素。据统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率超过40%,而中国该比例则仅为26.5%(徐光辉,2011)。涉及技术与市场等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大多被外资控制,其中外资对中国工业的技术控制度达30%左右,同期国际警戒线为20%;外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控制度已高达65%(李孟刚,2011)。适应中国国情,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和地位,已成为制造业升级的核心问题。然而,这一过程面临诸多障碍,集中表现为两大矛盾:一是自身能力不足与国际壁垒提升并存,使得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提升的成本不断提高(文婧,曾刚,2005)，“价值链锁定困境”和“贫困化增长”风险日益增大(Schmitz,2004;刘志彪,郑江淮,2012);二是价值链整体低端化与局

[收稿日期] 2013-07-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创新研究”(批准号 11CJL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非均质后发大国中经济极化、区域互动与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批准号 11YJC790307);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计划“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及风险管理研究”(批准号 12ZLZLZF07900)。

[作者简介] 周密(1980—),女,湖南岳阳人,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部区域的差异化发展并存,使得一国整体的升级战略对局部区域并不适用,影响提升的可持续性。这两大矛盾是执行传统二分法思路的必然结果。传统二分法将发达国家价值链高端作为预设单一外部参考目标,虽然能够指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版图中的大致位置(Xu Bin,2007;唐海燕,张会清,2009),但是没有考虑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刘志彪,张杰,2009)。同时,传统二分法中基于国家整体间的比较可能掩盖了整体之下局部的多样性,将后发转型国家可能呈现的多元路径线条化,掩盖了不同产业在空间配置结构上的巨大重组和调整。正如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并不是呈现向发达国家单一收敛一样^①,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和富两分法,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林毅夫,2012)。连续谱思想开始关注以自身现实起点为主的价值链提升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很难协调二分法与连续谱之间不同的路径设计取向,从而造成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割裂。少数文献试图加强二者的联系(刘友金,胡黎明,2011),但多以定性探讨或案例分析为主,缺少实证证据的支持(Oscar, Jorge,2012; Danielle Berman,2011)。那么,站在转型进程新阶段的起点,中国如何能够既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又兼顾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差异,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和地位呢?

本文认为单一嵌入全球价值链只能形成对高端价值链的被动追逐与形式模仿,只有深度考察双重价值链要求下的价值链结构特征及空间组织变化才能寻找价值链提升的新出路。后发转型大国要形成价值链提升的主动权不仅需要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陶锋,李诗田,2008;Morrison et al.,2008),还需要不同区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关键行动。由双重价值链匹配紧密度与匹配高度形成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四大区域的价值发现起点;价值管理依赖要素、结构、制度与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动态化调节,将形成价值链提升的实现手段;而初始条件约束下的多重均衡与影响因素的差异化调节共同决定了价值创新的多元化路径,形成“价值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新”的提升逻辑。

二、价值链的双重性: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匹配

后发转型大国起点较低的特点使其无法遵循传统二分法,而应该考虑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由于层次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价值链双重性。如果国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比如25%,而价值链低端的增加值占全球价值链20%的话,那么,国内价值链反而比全球价值链能带来更好的收益(刘志彪,郑江淮,2012),因此,充分考虑价值链的双重性有助于了解后发转型大国价值链提升的客观现实,形成“可描述”的价值发现。

1. 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

进出口内生于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因此,进出口是价值链提升过程的重要特征,其变化反映了比较优势的变化(Alejandro Jara,Hubert Escaith,2012)。在测度一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时,主流的做法是基于出口角度进行考察(Lall et al.,2006; William Powers,2012),并借鉴Hausmann et al.(2007,2011)的出口复杂度或Wang Zhi and Wei Shang Jin(2008)的出口商品结构相似度指数来测算。基本结论为:出口复杂度和相似度指数均显示1992—2006年间中国价值链具有不断提升的趋势(Dani Rodrik,2006; Xu Bin,2007; 唐海燕,张会清,2009)。这种方法遵循传统二分法,将发达国家所处的价值链高端作为外部参考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设计提升路径(Kaplinsky,Fitter,2004)。本文首先借鉴Wang Zhi and Wei Shang Jin(2008)的研究方法,以出口商品结构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ESI)的原理作为构建框架,即以所要研究的区域与价值链高端参照区域的出口产品结构之间的差异反映该区域与价值链高端的相对距离。出口相似度(ESI)指数的基本构建方法如下式所示。

^① 新古典模型的关键预测之一是人均收入的空间差距从长期来看将会收敛,但是赶超过程的发生程度将会有差异。

$$ESI_{it} = \sum_{j=1}^m \text{Min}(S_{ijt}, S_{rjt}) \quad (1)$$

其中 S 表示某一商品在出口总量中的比例, 下标 i 表示所要研究的区域, r 表示参照区域, j 表示出口种类, t 表示时间。 ESI 的取值在 0 到 1 之间。当参照区域为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区域时, ESI 越接近 1, 说明该区域与参照区域的出口产品结构越相似, 区域越靠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反之, 该区域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越低(唐海燕, 张会清,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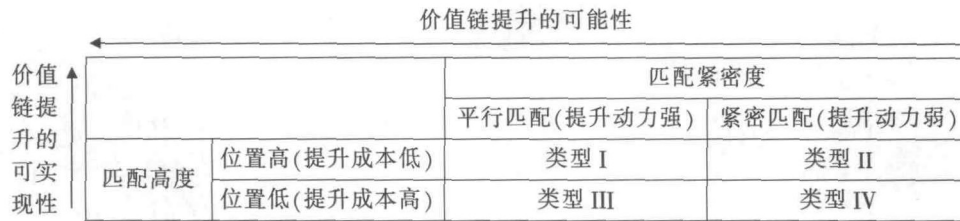
为了建立双重价值链基准, 我们需要构建两类指数。第一类是能反映全球价值链的指数, 表示为 ESI_w , 用所要研究区域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相对距离来度量。在该指数的建立中, 本文从科技水平角度对参照区域进行选择。从科技水平看, 1999—2011 年间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向欧洲专利局 (EPO) 申请的专利数量一直处于 OECD 成员国的前四位, 说明这四国的科技水平位于世界前列, 相应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据此本文选择以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四国为参照区域。为了保证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具有可比性与统一性, 本文按照相同的原理构建第二类指数——国内价值链指数, 表示为 ESI_n , 以体现各省份与国内价值链高端的相对距离。按照这一原理进行构造是基于如下理由: 以东亚等地为例, 东亚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增长率, 这是由于东亚国家成功地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改善了它们融入国际经济的地位(韩琦, 2008), 因此, 出口结构仍然是一国内部价值链提升的最重要体现。按照 2003—2011 年专利申请的综合排名, 本文选择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为参照区域。具体测算中, 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的出口结构数据来自 UNcomtrade 数据库; 中国各省份出口结构数据来自国研网工业企业数据库。在计算各省份的过程中, 本文根据盛斌(2002)总结的 SITC(Rev.3.0)分类标准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标准行业分类标准(GB/4757-2002)之间的对照表进行行业匹配。参考区域的出口结构数据均取最新年份的数据, 即 2011 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出口数据。

2. 双重价值链匹配: 基于匹配紧密度与匹配高度的时空演进分析

(1) 匹配紧密度与匹配高度。后发转型大国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提升, 既要克服原有均衡形成的低端锁定与路径依赖, 降低向高端提升的成本(林毅夫, 2012); 还需要强化不断向高端提升的持续动力(柳卸林, 陈傲, 2012)。单一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无法同时兼顾提升成本与提升动力问题, 当综合考虑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时, 如何通过二者链条关系的双重匹配与平衡解决提升成本与动力兼顾的问题呢? ①匹配紧密度。匹配关系分为平行匹配和紧密匹配。当匹配关系呈现平行匹配时, 说明双重价值链中有一种链条具有比较优势, 两利相权取其重, 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动力强, 可能性较大。这种情况下, 需要在双重价值链中有效利用比较优势。其中, 如果国内价值链高于全球价值链, 则意味着这些区域跨越价值链低端锁定已经具备了国内能力, 需要利用国内能力向全球价值链延展。如果全球价值链高于国内价值链, 则意味着国内能力薄弱, 比较而言, 全球价值链具有比较优势, 需要利用全球价值链基础, 夯实国内能力。当匹配关系呈现紧密匹配时, 则说明双重价值链中任意一种的比较优势不明显, 价值链提升的动力弱, 实现价值链提升的可能性小。这种情况下, 需要在双重价值链中构建比较优势。②匹配高度。在何种高度的位置进行匹配, 说明考察区域处于价值链的何种位置, 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可实现性大小。其中, 当在较低位置匹配时, 意味着从当前位置向价值链高端位置提升的距离远, 成本大, 可实现性小; 当在较高位置匹配时, 意味着当前位置离价值链高端距离近, 从当前位置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成本低, 可实现性大。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在匹配紧密度与匹配高度上存在差异, 如图 1 所示, 形成四大基本匹配形式。

(2) 时空演进特征。根据双重价值链的匹配度框架, 对中国 31 个省份 2003—2011 年双重价值链匹配的空间结构进行测算, 获得中国价值链提升的四类区域。

类型 I: 在较高位置平行匹配——提升成本低, 提升动力强(见图 2)。北京、福建、广东、江苏、上海、天津六个省份的双重价值链在较高的位置平行匹配, 国内价值链定位相对高于全球价值链定



位。其中在较高的位置匹配说明这些区域离价值链高端距离较近,向全球价值链高端靠近的成本较低。国内价值链定位高于全球价值链定位说明这些区域与国内参照目标的差距小于这些区域与国际参照目标的差距。这意味着这些区域跨越价值链低端锁定已经具备了国内能力,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①最具国内优势,向全球价值链靠近的动力强。事实上,广东、上海、江苏地区的很多企业,既融入由美国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以被俘获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也加入由欧洲跨国企业主导的松散型价值链,同时拥有大量自主的对东南亚、南美洲和非洲的出口独立品牌以及并不依赖于中介代理的直接销售(刘志彪,郑江淮,2012)。近年来,中国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都快速增长,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对发达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达 466.4 亿美元,占全部投资存量的 11%;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投资存量达 551.7 亿美元。因此,亟需面向全球市场,利用已经较为成熟的产业能力,尽快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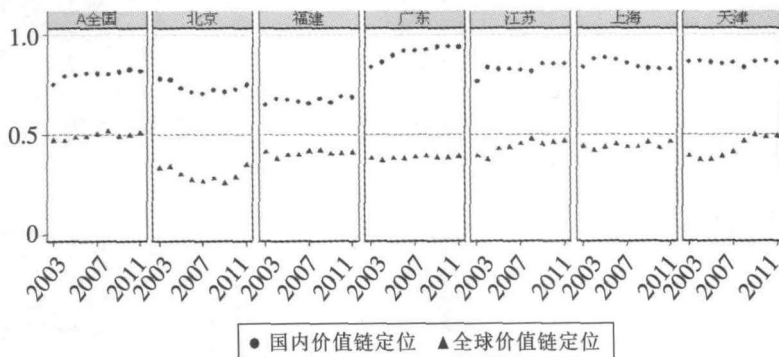


图 2 类型 I 的双重价值链匹配
资料来源:本文研究整理。

类型 II:在较高位置紧密匹配——提升成本低,提升动力弱(见图 3)。湖北、江西、辽宁、山东、四川、浙江六个省份双重价值链呈现出在中高端位置紧密匹配的特点。其中双重价值链处于中高端位置,说明这些区域与全球价值链高端距离较近,价值链提升的成本较低。双重价值链呈现紧密匹配关系,说明这些区域与国内参照目标的差距和这些区域与国际参照目标的差距相当,比较优势并不明显,价值链提升的动力较小,亟需根据双重价值链特点构筑比较优势。价值链扩展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基于出口产品类型扩展为主的横向方式;二是基于要素密集度提升的纵向方式。从本文指数的构造看,该类型区域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较高,这意味着跟四国相比,出口产品的类型、规模较为相似。从测度值看,这些区域在食品加工、纺织、木材加工、家具制造、石油加工、金属制品及通用设备^②等领域具有产品结构优势,但是,由于技术或市场所带来的增加值率或附加值较低造成了提升动力弱的情况。因此,这类区域主要的任务并不是产品类型的横向扩展,而是基于已有的优势产业提升附加值,加强产品的技术含量、创新水平与市场网络控制力,实现产品技术的升级。

① 本文测算出类型 I 区域的这几类产业排位最前,测算值分别为 0.5012、0.1085、0.0387、0.0353、0.0254。
② 以辽宁为例,这几类产业的测算值分别为 0.0087、0.0227、0.0101、0.0185、0.0851、0.0287、0.05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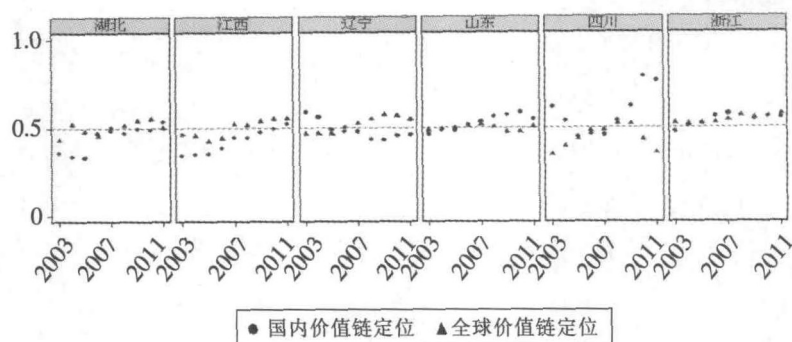


图3 类型II的双重价值链匹配

资料来源:本文研究整理。

类型III:在较低位置平行匹配——提升成本高,提升动力强(见图4)。图4所示的12个省份呈现:在低端位置平行匹配,国内价值链定位低于全球价值链定位。在低端位置匹配,说明价值链提升的成本高;平行匹配中国内价值链定位低于全球价值链定位,说明这类区域与国内的差距大于与全球的差距,相比羸弱的国内能力,全球价值链反而具有比较优势。这类区域是陷入被俘获或被锁定的典型代表。这类区域已经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是,国内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具有较强的提升动力,然而由于提升成本高,价值链提升的可实现性不大。这类区域可以不急于与国际的接轨,而应先提升国内价值链,重点在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①等具有基础的产业进行拓展,再向全球价值链靠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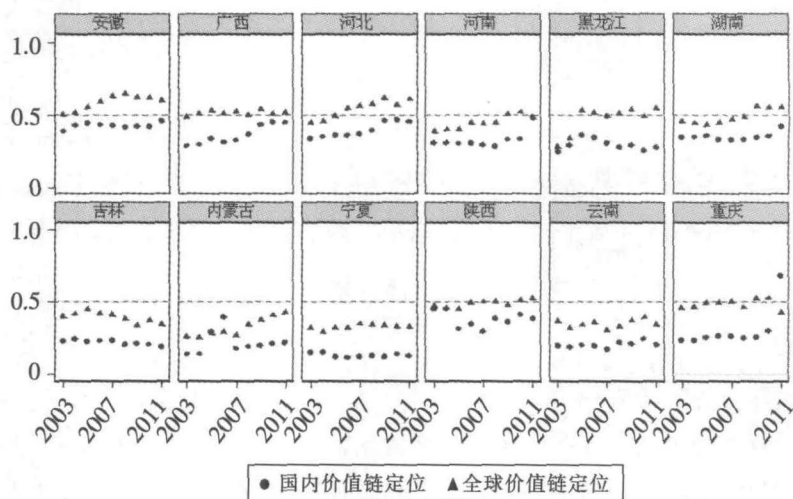


图4 类型III的双重价值链匹配

资料来源:本文研究整理。

类型IV:在较低位置紧密匹配——提升成本高,提升动力弱(见图5)。甘肃、贵州、海南、青海、山西、西藏、新疆七个省份在较低位置紧密匹配。从匹配位置看,这类区域处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成本较高;从匹配关系看,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相互交错,比较优势不明显,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动力不强。这类区域与本土发达区域相比,自身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与全球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也较大,因此提升成本高,提升动力小。这类区域的升级之路,既不能追逐全球价值链单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扩展或横向扩大出口产品类型;也很难以本土发达地区为发展

^① 以湖南为例,这几类产业的测算值分别为0.0303、0.0266、0.0427、0.0132、0.02914、0.1565、0.0142、0.0498。

目标。作为这类区域,当前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或国内价值链高端可能并不是其收敛的均衡,而挖掘自身特色资源,可能形成一条以自身独特发展为主的升级之路(Inge, Alvstam, 2010)。比如,海南的农副产品加工(0.2611),贵州的化学原料制造(0.4713)、非金属矿(0.0381),新疆的食品制造(0.3200)、纺织业(0.0599)、黑色金属冶炼(0.0283)等都具有明显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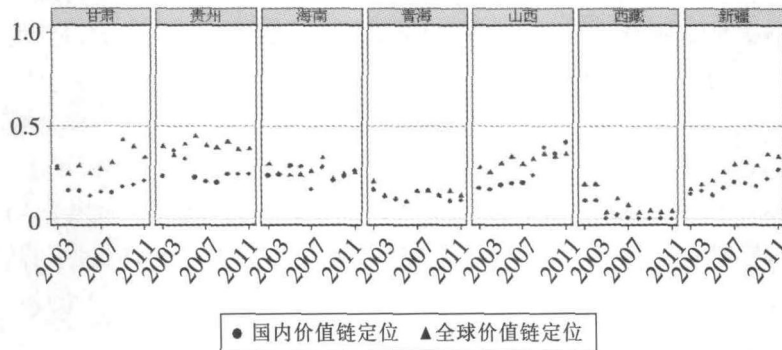


图5 类型IV的双重价值链匹配

资料来源:本文研究整理。

(3)上述匹配紧密度与匹配高度决定了中国各区域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可能性与可实现性,并依据成本与动力的差异形成了四大区域的新组合。这种组合成为下一阶段中国提升价值链份额与地位的现实起点,也是价值发现的过程。双重价值链范式下,价值发现揭示了现实起点的重要意义,这与单一嵌入全球价值链范式存在着较大差异,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实起点包含了地理条件、要素结构、工业基础、区域贸易等差异在内,既反映了由于大国经济多元性导致的发展层次差异;又反映了转型时期的空间特点,有的地区或部门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有的地区或部门又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这种现实起点所包含的层次化空间特征,有利于资源的优化组合,并使得以价值链的空间重组来带动产业升级有了广阔的空间。由于层次化空间,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等模式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与不同的部门同时进行,形成一种“链合升级”格局(刘友金,胡黎明,2011)。这种“链合升级”以四大经济区划为空间载体进行分类调整。另一方面,与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一样,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的结果部分的决定于初始条件的结构特征。现实起点所包含的历史因素与空间组合将决定价值链提升的多重稳态,引导不同区域价值链提升呈现群体趋同^①。这意味着,在现实起点约束下可能存在着多样化的升级目标,并不是以单一发达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为准。传统二分法内在地认为每个经济体都应该趋向唯一相同的稳态;而发达国家与后发转型国家间的空间起点差异显示,区域群体可能存在多重均衡点。由于每个区域个体的差异性,往往会产生多重均衡收敛的路径,因此,后发转型国家对各种扭曲进行改革时并不都是指向最优选择,而是可能指向次优选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国内价值链构建的东—中—西梯次推进路径并不现实。双重价值链所形成的现实起点客观上将引导不同区域以不同的目标进行分类推进。比如,根据前文分析,类型I和类型II区域应以瞄准国际市场为主,可以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和政策扶持,与全球技术和创新体系建立对接;类型III和类型IV区域应以瞄准国内市场为主,更多挖掘待开发市场和寻找自身特色。类型I和类型II区域并不必然与类型III和类型IV区域建立循环链条或产业转移,而是呈现各具特色的发展思路。具体来看,呈现如下基本方向。

对于类型I而言,由于提升成本低、提升动力强,因此,需要依托国内价值链,实现从国内价值链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跨越,推动链条对链条的突破(赵明亮,杨慧馨,2012)。其升级特征是将从现

^① 在经济增长收敛问题中,条件趋同的假说内在地与每个经济体只有唯一相同稳态的观点契合;而群体趋同却与每个经济体存在着多重均衡点的假定相联系。现实中,由于经济个体的差异性,往往会产生多重均衡增长路径,因此,即便结构特征相同的国家或地区也不一定收敛于同一稳态。

有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学习的知识运用于另一个全球价值链。其升级关键在于市场结构的调整,通过开拓全球新兴市场、涉足高收益的相关产业和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获取更多价值,收敛于全球价值链高端。

对于类型 II 而言,由于提升成本低、提升动力弱,这类区域的方向在于强化提升动力。在已有出口结构和规模的基础上,实现从环节对链条的升级。其升级关键在于技术结构的调整,从生产环节向设计、研发与营销环节跨越,通过转向更先进的生产线,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与创新水平,开拓国际市场网络等方式,以更高的技术、更优的质量和更强的品牌实现技术升级。

对于类型 III 而言,由于提升成本高,提升动力强,这类区域的重点在于降低提升成本,实现国内市场拓展对链条的提升(崔焕金,张强,2012)。其升级关键在于需求结构的调整,可以比照国内发达地区首先扩充自身的经济基础,充分挖掘国内需求与新兴需求,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比对手更快的开发产品品种和提高开发档次,推出新功能、新款式,先收敛于国内价值链高端;待经济基础夯实后,再进一步通过产品与功能的完善实现升级。与类型 II 相比,这种类型的提升路径在国内价值链提升上的任务更重,因此,对于区域内部需求的挖掘与开发要求更高。

对于类型 IV 而言,由于提升成本高、提升动力弱,其重点是专注于特色产品和产业,形成产品对链条的升级。其升级关键在于产品结构的调整,寻找适宜于自身的服务产品、服务产业类型,通过做细做精专业产品和产业,寻找本区域价值链提升的空间,可能收敛于自身的均衡,如呈现产品或工艺升级→功能升级。这类区域的提升路径可能呈现产品或工艺升级→功能升级→链的升级的渐进路径,也可能呈现产品或工艺升级→链的升级的跨越式路径。

三、影响双重价值链的主要因素

后发转型大国价值链的空间重组既需要从单一的全球价值链向双重价值链兼顾转变,也需要从东中西的完美承接向四大经济区划的差异化推进转变。那么,在战略方向明确的前提下,若要形成“可实施”的价值管理过程,应该从哪些因素的调节入手呢?

1. 价值链空间匹配度的测算

单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后发国家大多数仍处于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而从战略上平行构建“国内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却逐步实现价值链提升,例如日本、韩国等。根据上文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匹配高度与匹配紧密度,本文构建基于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比较的“价值链空间匹配度指数” K :

$$K = \ln \frac{\text{国内价值链定位}}{\text{全球价值链定位}} = \ln \frac{ESIn}{ESlw}; e^K = \frac{\text{国内价值链定位}}{\text{全球价值链定位}} = \frac{ESIn}{ESlw}$$

K 指数综合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涵盖了传统二分法中心—外围区域的比较,考虑了双重价值链中两层次比较优势的差异;另一方面动态考察若干年各时间点差异,包含了连续谱的要义^①。从这个意义上看, K 指数试图实现双重价值链的完美结合;跳出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结构的过程和与本国不同区域多样化发展禀赋群体趋同的过程。这既保留了传统二分法的结构主义内核,同时又吸收了连续谱的动态合理成分,是传统二分法与连续谱调和的产物。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仅考虑工业出口产品,且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我们主要选取了 2003—2011 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结果如表 1 所示。

2. 影响因素的选择

现有文献认为,基础要素、分工结构、市场制度是影响价值链提升的主要因素(唐海燕,张会清,

^① 本文计算了基于全国视角的全球价值链测度值,2006 年为 0.49,与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测度的 2006 年 0.4384 的结果基本一致,这也印证了本文结果的可信度。此外,我们测度的 2011 年结果为 0.51,较 2006 年有所提高,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提高。

表 1

 e^k 分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安 徽	0.7633	0.8278	0.8013	0.7306	0.6807	0.6430	0.6784	0.6767	0.7642
北 京	2.3349	2.2627	2.4254	2.5988	2.6609	2.5689	2.7498	2.5139	2.1365
福 建	1.5654	1.7914	1.6922	1.6714	1.5648	1.6140	1.6269	1.6949	1.6667
甘 肃	1.0279	0.6258	0.5254	0.5038	0.5399	0.4692	0.4115	0.4715	0.6239
广 东	2.1923	2.3117	2.3439	2.4093	2.3530	2.3451	2.4359	2.4362	2.3867
广 西	0.5920	0.5784	0.6350	0.6069	0.6175	0.7329	0.7976	0.8871	0.8675
贵 州	0.5835	1.0726	0.7976	0.5021	0.5075	0.5129	0.5790	0.6403	0.6359
海 南	0.7895	0.9688	1.2123	1.1901	0.6204	0.8368	0.9561	0.9422	1.0277
河 北	0.7502	0.7539	0.7218	0.6491	0.6519	0.6780	0.7420	0.8138	0.7422
河 南	0.7856	0.7722	0.7509	0.6820	0.6610	0.6373	0.6547	0.6382	0.9820
黑龙江	0.8867	0.8481	0.6711	0.6706	0.6174	0.5439	0.5362	0.5124	0.5035
湖 北	0.8250	0.6412	0.6872	1.0271	0.9587	0.9142	0.9100	0.8840	1.0671
湖 南	0.7509	0.7800	0.8248	0.7233	0.6852	0.6730	0.6143	0.6432	0.7618
吉 林	0.5655	0.5751	0.4964	0.5381	0.5616	0.5326	0.6187	0.5482	0.5360
江 苏	1.9515	2.2100	1.9180	1.8939	1.8010	1.6967	1.8892	1.8532	1.8309
江 西	0.7404	0.7609	0.8319	0.8685	0.8517	0.8603	0.8845	0.8969	0.9434
辽 宁	1.2578	1.1928	1.0459	0.9550	0.9079	0.7900	0.7504	0.7977	0.8398
内蒙古	0.5207	0.5386	1.0129	1.3311	0.6527	0.5456	0.5186	0.5148	0.5032
宁 夏	0.4692	0.5077	0.3620	0.3583	0.3450	0.3595	0.3585	0.4116	0.3872
青 海	0.7812	0.9391	0.9095	0.9540	0.9981	1.0169	1.0241	0.6352	0.8017
山 东	0.9496	0.9774	0.9688	1.0104	1.0276	1.1178	1.2005	1.2227	1.0777
山 西	0.5958	0.6337	0.6104	0.5764	0.6541	0.7281	1.0972	1.0412	1.1734
陕 西	0.9515	0.9858	0.6952	0.6931	0.5908	0.7660	0.7452	0.7998	0.7258
上 海	1.8848	2.0708	2.0306	1.9351	1.9611	1.9127	1.7954	1.8995	1.7772
四 川	1.7691	1.3552	1.0229	0.9520	0.9403	1.0317	1.1887	1.8171	2.1274
天 津	2.1907	2.3086	2.2895	2.1770	2.0821	1.7875	1.7258	1.7769	1.7337
西 藏	0.5246	0.5246	0.0846	0.1948	0.0740	0.0846	0.0849	0.0846	0.0849
新 疆	0.8599	0.8029	0.6096	0.6650	0.6770	0.6309	0.6075	0.6179	0.7947
云 南	0.5361	0.5807	0.5784	0.5519	0.5645	0.6564	0.5614	0.6169	0.5833
浙 江	0.9030	0.9787	0.9936	1.0602	1.0633	1.0013	0.9848	0.9914	0.9636
重 庆	0.5020	0.4965	0.5090	0.5344	0.5262	0.5281	0.4861	0.5635	1.5880
全 国	1.5843	1.6824	1.6388	1.6476	1.6052	1.5490	1.6475	1.6583	1.6171

资料来源:本文研究整理。

2009;Stephan Manning et al.,2012)。德勤有限公司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2013 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通过对全球首席执行官的调查显示,影响国家制造业竞争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中:人力资本、邮政与金融服务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的排位分别为第一、第二、第六。物质资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但是却与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本地吸引力等关键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根据现有研究基础,在基础要素中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邮政与金融服务水平。此外,在分工结构中考虑专业化程度,在市场制度中考虑市场化程度。其中,人力资本(Hum)为每 10 人在高校生人数,物质资本(Cap)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交通基础设施(Tra)根据铁路、公路、水运、客运和货运量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的得分,邮政服务水平(Pps)为邮电业务总量,金融服务水平(Ban)为国内贷款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市场化程度(Mar)为樊纲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专业化分工(Gsi)为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为了研究被解释变量的演变是否具有路径依赖效应,本文在回归式中加入了其一阶滞后变量。对于缺少的统计数据,包括西藏 2003 年相关统计及 2010—2011 年的市场化指数等均采用插值法进行估计。以上原始数据除市场化指数外均来自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计量模型为:

$$K_{it}=C+\beta_1\ln_Hum_{it}+\beta_2\ln_Cap_{it}+\beta_3\ln_Tra_{it}+\beta_4\ln_Pps_{it}+\beta_5\ln_Ban_{it}+\beta_6\ln_Mar_{it}+\beta_7\ln_Gsi_{it}+\lambda K_{it-1}+e_{it}$$

Hausman 检验拒绝模型是随机效应的假设,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2。

	M_all	U_all	M_type1	U_type1	M_type2	U_type2	M_type3	U_type3	M_type4	U_type4
ln_Hum	0.170 (1.401)	0.105 (0.825)	0.029 (0.365)	0.016 (0.158)	0.438** (1.999)	0.337 (1.505)	0.480 (1.230)	0.817** (2.499)	-0.225 (-0.714)	-0.524 (-1.355)
ln_Cap	0.284*** (2.701)	0.267** (2.514)	-0.134* (-1.847)	-0.052 (-0.627)	0.061 (0.394)	0.155 (0.936)	-0.325 (-1.613)	0.130 (0.659)	1.046*** (3.463)	1.133*** (3.372)
ln_Tra	-0.182*** (-3.741)	-0.034 (-0.726)	-0.046* (-1.689)	-0.039 (-1.445)	-0.042 (-0.376)	-0.040 (-0.357)	0.262 (1.632)	-0.096 (-0.736)	-0.420*** (-4.184)	-0.338** (-2.673)
ln_Pps	-0.088* (-1.965)	-0.098** (-2.451)	-0.014 (-0.557)	-0.025 (-0.990)	-0.148** (-2.162)	-0.135** (-2.079)	-0.057 (-0.623)	-0.073 (-1.131)	-0.148 (-1.247)	-0.133 (-1.133)
ln_Ban	0.173*** (3.200)	0.151** (1.990)	0.073** (2.632)	0.198** (2.726)	0.186** (2.165)	0.205* (1.900)	-0.020 (-0.148)	0.315* (1.840)	0.293** (2.027)	0.017 (0.091)
ln_Gsi	-0.779*** (-3.617)	-0.465** (-2.134)	-1.047*** (-3.658)	-0.785** (-2.166)	-1.037*** (-2.659)	-1.078*** (-2.745)	-0.895* (-1.692)	-0.368* (-0.761)	0.484 (0.961)	0.693 (1.308)
ln_Mar	-0.188** (-2.135)	-0.107 (-1.288)	0.022 (0.159)	0.035 (0.242)	-0.216 (-0.593)	-0.154 (-0.349)	-0.632 (-0.937)	-0.441 (-0.831)	-0.340** (-2.455)	-0.271* (-1.851)
L.ln_K		0.411*** (6.735)		0.248 (1.659)		0.446*** (3.896)		0.812*** (6.286)		0.043 (0.337)
_cons	0.454 (1.421)	0.428 (1.255)	0.030 (0.056)	0.215 (0.341)	0.672 (0.656)	0.640 (0.571)	1.257 (0.634)	2.806* (1.872)	-0.393 (-0.691)	-1.445* (-1.791)
N	279	248	54	48	108	96	54	48	63	56
R ² _a	0.068	0.165	0.483	0.538	0.064	0.236	-0.029	0.485	0.481	0.326

注:()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M_ 为不包含路径依赖的计量结果;U_ 为包含路径依赖的计量结果。

资料来源:本文研究整理。

由于考虑了双重价值链,因此,上述结果中系数的含义不是简单的增减比例,而是反映对不同价值链影响弹性的差异^①,其中系数为正说明该因素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国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系数为负说明该因素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弱于其对国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后发转型大国和四种不同类型区域的价值链提升路径中具体影响因素差异如下所示。

(1)后发转型大国。当不考虑路径依赖因素时,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邮电服务、金融服务水平、市场化制度、专业化指数均有显著影响。当考虑路径依赖因素时,物质资本、邮电服务、金融服务水平、专业化指数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物资资本、金融服务和路径依赖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邮电服务和专业化指数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

(2)类型 I 区域。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专业化指数因素影响显著,其中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专业化等因素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更强;金融服务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

① $ESI=X_1^{a_1}X_2^{a_2}$, a 为因素 X 对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弹性。 $\frac{ESIn}{ESlw} = \frac{X_1^{n_1}X_2^{n_2}}{X_1^{w_1}X_2^{w_2}} = X_1^{n_1-w_1}X_2^{n_2-w_2} = X_1^{\beta_1}X_2^{\beta_2}$, $\beta=n-w$, $\left\{ \begin{array}{l} \beta \geq 0 \Rightarrow n \geq w \\ \beta < 0 \Rightarrow n < w \end{array} \right.$, $K=\ln(\frac{ESIn}{ESlw})=\beta_1\ln X_1+\beta_2\ln X_2$, 当 $n>w$, 认为因素 X 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国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对应上式将有 $\beta>0$,反之若 $n<w$, $\beta<0$,则认为因素 X 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弱于其对国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

响更强。结合前文对第 I 类区域基本路径的判断,对这一类区域而言,在利用金融服务强化国内优势基础上,重点利用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专业化分工推动链条向全球价值链的提升。

(3)类型 II 区域。当考虑影响显著的路径依赖因素时,邮电服务、金融服务、专业化因素影响显著,其中路径依赖和金融服务因素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邮电服务总量和专业化指数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结合前文对这类区域需要实现技术与功能升级的基本判断,这类区域需要立足现有与全球价值链中产品类型较为一致的优势,依靠流通成本降低和分工结构提高,降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提升的成本。

(4)类型 III 区域。人力资本、金融服务、不显著和路径依赖效应显著,其中人力资本、金融服务、路径依赖等因素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结合前文这类区域需要首先扩充自身的经济基础,待经济基础夯实后,再进一步通过产品与功能的完善实现升级的基本判断。这类区域未来需要依靠人力资本、银行等金融服务以及现有的基础提升国内价值链的水平。

(5)类型 IV 区域。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市场化的影响显著,其中物质资本和金融服务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和市场化制度因素对全球价值链定位的影响强于其对国内价值链定位的影响。结合前文这类区域提升动力不足与提升成本较高的判断,这类区域的提升路径重点借助物质资本投入和融资等方式促进自身向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动力;同时,借助交通基本设施和市场化制度的建设降低向全球价值链的提升成本。

总体来看,全球价值链嵌入型范式下,价值链提升更多的按照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技术供给类型进行调整,强调对产品—结构等关系进行组合与配置。双重价值链考虑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价值结构等供给类型,并兼顾不同区域可能具有的资源特色、需求结构、消费结构等要素禀赋和市场需求类型,而且,强调对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中要素、结构、制度、现实起点等因素的全面理解,以自身的动态增长为中心,将引入知识、技术、管理、资源等要素配置方式与本土市场需求、制度状况等相结合,对区域现实—动态因素—区域需求等关系做出新组合和新调整,形成“价值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新”的价值链提升逻辑。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后发转型大国重塑价值链的空间结构需要整合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双重特性。本文通过构建“双重价值链空间特征识别—影响因素差异化弹性调节—多元化提升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论证“价值发现—价值管理—价值创新”的价值链提升理论逻辑。构建双重价值链匹配高度与匹配密度的二维框架,从时空演进角度测算出实现双重价值链提升的四大不同区域类型,并指出这四类区域在价值链提升的形式、特征与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类型 I 和类型 II 区域应以瞄准国际市场为主,类型 III 和类型 IV 区域应以瞄准国内市场为主。分类来看,类型 I 应推动链条对链条的升级,以市场结构调整为重点;类型 II 应推动环节对链条的升级,以技术结构调整为重点;类型 III 应推动国内市场需求对链条的升级,以消费结构调整为重点;类型 IV 应推动产品对链条的升级,以产品结构调整为重点。这是价值发现的过程,也是价值链空间重组的起点。同时,本文实证分析了要素、结构、制度与路径依赖等因素对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不同影响弹性。这是价值管理的核心,也是价值链空间重组的实现手段。初始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的差异化调节共同决定了四大区域的价值创新,形成价值链提升的多元化路径。具体对策如下:

1. 明确四大经济区划,建立以“国内价值链区域联盟”为主导的价值发现主体

后发转型大国实现价值链提升需要突破行政区划局限,从双重价值链匹配所形成的四大经济区划角度进行系统整合。四大经济区划意味着区划内的地区在双重价值链匹配上具有同质性,区划间的地区在双重价值链匹配上具有异质性,因此,可以基于同质区域的认同感构建以“国内价值链区域联盟”为主导的空间治理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六大行政区,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撤销

六大行政区建立七大经济协作区(陈秀山,孙久文,2007),这都是试图按照大区制来管理经济。然而,过早实行大区制,不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本文分析显示经过62年发展,价值链的提升呈现了明显的空间结构特征。依托这种经济与空间基础,可在现有环渤海区域联盟、长三角区域联盟、东北区域联盟等区域管理机构基础上,加快形成“国内价值链区域联盟”,可以选择1—2类区域中的不同地区或产业进行价值链提升的示范,如第II种类型中选择湖北、辽宁、四川等地进行技术升级示范。重点对“国内价值链区域联盟”进行两大方面制度创新:一是明确该联盟的登记条件、运行机制和权责范围等,允许联盟常设机构、研发机构注册为非营利法人实体。对联盟会员费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联盟成员间接受联盟其他成员的研发费用免除所得税和营业税。二是将联盟常设机构、秘书处等管理机构、决策程序、人员配备等完整的组织构建纳入到中国各类基金、计划、政策资助的决策与议事体系。此外,该区域联盟应承担区域重点产业的信息沟通、人员培训等基本功能,同时可对价值链提升过程中的困难与问题进行识别,并将其纳入区域政策的作用范畴,通过直接援助、间接援助、控制措施、协调与基金工具等方式进行政策推动。

2. 推动价值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双重价值链的衔接转化

本文认为双重价值链范式下价值管理的关键是“将引入知识、技术、管理、资源等要素配置方式与本土市场需求、制度状况等相结合”,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高效的制度保障。①管理体制上,重点是建立要素配置的完善组织架构。可在已有创新体系框架下逐步引入价值链增量调整。按照现有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创新工程与技术创新工程的基本脉络,将双重价值链的分类调整,分阶段、分步骤地纳入该体系的工作范畴。可首先以技术创新工程中的创新型企业、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创新服务体系等已有体系为支撑,建立管理组织架构。②管理机制上,重点形成有利于挖掘市场需求、优化制度环境的考评机制,以全球发达目标与本土先进目标为基础建立双重价值链提升考评机制。从区域空间特色与价值发现、区域因素调节与价值管理、区域路径选择与价值创新等不同层面建立积分考评体系,替代单一以GDP或专利为主的结果式考评指标,从而达到既考核价值链提升效果的目的,又引导不同区域向重视价值链高端提升的行为与过程转变。③衔接转化体系上:一是基于行政体系的衔接与转化。通过现有的行政体系,利用国家科技、经贸、产业的主管部门的垂直体系进行双重价值链的管理与对接;二是基于联盟、协会、商会等市场组织的衔接与转化。最终,形成以技术平台为主的专业组织衔接和以服务平台为主的社会组织衔接。

3. 改变政策同质化的格局,形成以“价值发现—价值管理”为基础的价值创新组合

当前,在提升价值链的政策设计中呈现政策工具千篇一律和政策指向跟风式推进两大弊病。基于本文提出的价值发现—价值管理过程,将形成价值创新的分类组合。

(1)以全球化为导向的链条升级。类型I区域应瞄准国际市场,在利用金融服务强化国内优势基础上,重点利用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专业化分工推动链条向链条的提升。利用金融服务推动本土重点产业或产业集群的拓展,服务主要指向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利用物质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专业化等进行市场结构调整。市场结构调整的方向:一是立足国内价值链的优势,充分挖掘全球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潜能,通过底层创新与低端破坏创新逐步占领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市场。二是通过并购等方式实现对高技术领域、研发及销售网络等投资,并注意规避发达国家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

(2)以转化应用为导向的技术升级。类型II区域也应以国际市场为重点,然而与类型I不同的是,这类区域需要从单纯扩大产品出口品种的创新向立足于现有品种提升技术、品质与品牌转变。这类区域本身并不是研发强省,因此,技术结构调整并不能单靠研发投入的增加,而是强调通过对研发成果的应用转化提升技术与品质。这类区域技术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研发转化环节的经费投入与主体参与。一方面需要继续增加食品加工、纺织、木材加工、家具制造、石油加工、金属制品及通

用设备等优势产品或产业的引进消化吸收经费;另一方面需要培育发展创业创新型科技中介机构。可针对上述重点产业,依托现有的工业园、功能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等组织形式对中介机构进行整合,打造一批类似于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英国技术集团、德国史太白集团的品牌中介机构。在支持大型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中试车间或基地外,促进大学科技园、产业化基地、共建科技转化平台、联合共建研究机构、科技特派员等多元化转化方式与主体的形成。此外,通过提高邮电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物流成本,通过加快制造业企业的纵向合作等方式提高分工水平来同步推动全球价值链。

(3)以国内市场拓展为导向的功能升级。类型 III 区域以缩小与国内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为重点,调整需求结构,盯住国内市场,拓展区域产业服务功能。人才建设、资金融通与经济基础是这类区域价值创新的重要实现手段。基本方向是:在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产业中,向农村消费市场和第二、三线城市消费市场等多层次消费市场拓展,通过消费拉动的方式拓展链条。同时,加大与国内先进地区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特别是承接发达地区优秀人才的转移,加快高素质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加快推动人才红利的形成。重点针对熟悉农村市场和第二、三线城市的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建立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实施人才专业资格认证制度,资助与先进国家与地区的成熟机构联合培养,建立不同系列的高端人才资助计划等。

(4)以专精化为导向的产品升级。类型 IV 区域亟需依托特色资源,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扩大融资渠道等方式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专精化产品,优化产品结构。可弱化规模的导向,以增加值率、就业率等标准形成区域范围内乃至全国的一个或两个细分行业的领先者。如西藏、青海的农副食品加工业,海南的农副产品加工,新疆的食品制造业与纺织业,贵州的化学原料、非金属矿加工等就可形成特色资源拓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设施和市场化制度等软件设施,快速缩短与国内发达区域的差距。

[参考文献]

- [1]Schmitz, H.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 Recent Findings [R].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DRUID; 2004.
- [2]Xu Bin. Measuring China's Export Sophistication [R]. 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7.
- [3]Oscar F. Contreras, and Jorge Carrillo. Local Entrepreneurship with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Case Study in the Mexican Automotive Industry[J]. World Development, 2012,40(5).
- [4]Danielle Berman. When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Not Global: Case Studies from the Russian Fast-Food Industry[J]. Competition and Change, 2011,15(4).
- [5]Morrison A., Pietrobello, Rabellotti R.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to Study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8,36,(1).
- [6]Alejandro Jara, and Hubert Escaith. Global Value Chains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and Policymaking in a Flattening World[J]. World Economics, 2012,13(4).
- [7]Lall, S., Weiss, J., and J.k. Zhang. The Sophistication of Exports: A New Trade Measur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6,34(2).
- [8]William Powers. The Value of Value Added Measuring Global Engagement with Gross and Value-added Trade [J]. World Economics, 2012,13(4).
- [9]Hausmann. R., Hwang, and Rodrik.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12(1).
- [10]Hausmann R., Hidalgo C., Bustos S., Coscia, M., Chung. S.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R]. Boston, USA, 2011.
- [11]Wang Zhi, and Wei Shang Jin. What Accounts for the Rising Sophistication of China's Exports [R]. NBER Working Paper, 2008.

- [12]Kaplinsky R,Fitter R.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Who Gains When Commodities Are Decommodifie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2004,(1).
- [13]Inge Ivarsson, and Claes Göran Alvstam. Supplier Upgrading in the Home-furnishing Value Chain: An Empirical Study of IKEA's Sourcing in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0,38(11).
- [14]Stephan Manning, Frank Boons, Oliver von Hagen, Juliane Reinecke. National Contexts Matter: The Co-Evolution of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2,83(8).
- [15]徐光辉. 从价值创造开始——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J]. 管理世界, 2011,(11).
- [16]李孟刚. 中国产业安全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17]文婧,曾刚.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升级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7).
- [18]刘志彪,郑江淮. 价值链上的中国:长三角选择性开放新战略[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 [19]唐海燕,张会清.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J]. 经济研究, 2009,(9).
- [20]刘志彪,张杰.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内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 学术月刊, 2009,(9).
- [21]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2]刘友金,胡黎明. 产品内分工、价值链重组与产业转移[J]. 中国软科学, 2011,(3).
- [23]陶锋,李诗田. 全球价值链代工过程中的生产开发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J]. 管理世界, 2008,(1).
- [24]Dani Rodrik. 中国的出口有何独到之处[J]. 世界经济,2006,(3).
- [25]韩琦. 拉美的新结构主义理论——转型时期现代化道路的新思考[J]. 拉丁美洲研究, 2008,(6).
- [26]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7]柳卸林,陈傲.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1[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 [28]赵明亮,杨慧馨.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生产网络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重构[J]. 产业经济评论, 2012,(3).
- [29]崔焕金,张强. 全球价值链驱动模式的产业升级效应[J]. 首都经贸大学学报, 2012,(1).
- [30]陈秀山,孙久文. 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The Value Chain's Spatial Reorganization and Upgrading Path on Late-coming Transformation Country

ZHOU Mi

(Colleg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Embedded paradigm of global value chain, upgrading path of value chain will fall into a passive form of chase and imitate. Double value chain paradigm emphasizes the constraint function embedded in global value chain,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diversified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value chain.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change on dual value chain is a new way of value chain upgrading. Based on the dual value chain matching compactness and the matching height, the paper takes the evolution estimate of time and space, points out and demonstrates the logic “value finding–value management–valu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ual value chain elastic–different factor elasticity–diversification path”. The paper views that, the double value chain has formed four economic zones, that formed value finding, this is also the initial condition of the value chain upgrading; Elements, structure, system and path dependence and other factors have different effect on the double value chain, that is the key of value management and also the formation means of ascent; Multiple steady state with initial restrictions and different influence factors determine the four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upgrading path, which formed value innovation and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 oriented chain upgrading,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oriented technology upgrading, domestic market expand oriented function upgrading, specialization oriented product upgrading.

Key Words: globe value chain; national value chain; spatial reorganization; upgrading path

JEL Classification: L16 L60 O18

[责任编辑:鲁舟]